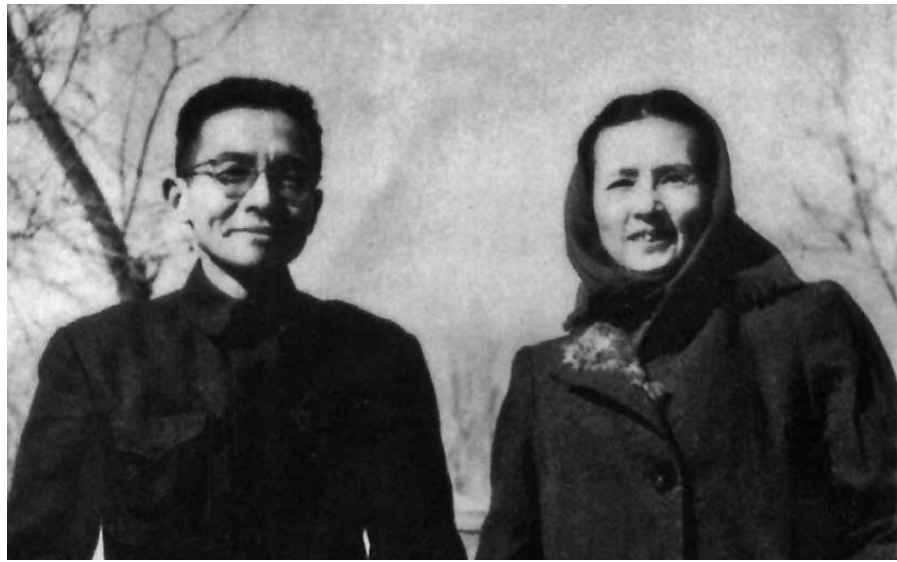


大家·同心同行

梁思成林徽因：赤子之心，并肩而行

□ 费 祎

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建筑史家和建筑教育家。他早年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到美国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修习建筑专业，1928年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于东北大学建筑系、中国营造学社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终其一生，梁思成在现代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城市规划、历史文物保护、建筑学术团体的创建和组织等多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在艰苦的环境中，梁思成的妻子，也是他的同行，才思敏捷的诗人林徽因，一直与丈夫一起并肩战斗，两人共同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梁思成(1901—1972)，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林徽因(1904—1955)，祖籍福建闽侯，生于浙江杭州。

保护古建筑：初识共产党

1948年，解放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梁思成被国民党政府率先列入“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名单。是走还是留？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已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安家立业的梁思成夫妇面临着选择。他们坚定地留在了大陆。

梁思成曾自白，他之所以留在北平不走，一方面是由于“对反动政府已不存丝毫幻想”，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有期待，他“自己认为在思想上同共产党是接近的，所以愿意留在这里等共产党来”(梁思成《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其实，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是对政治不热衷、不敏感的学者，梁氏夫妇做出如此决定，更多的是出自学者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于建立一个完整、强大的民族国家充满期待，也愿意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于新社会，尽更多的社会责任。此外，和中国共产党的初次相逢与合作，让他们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很有好感。

过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生活圈子里多是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和左翼学者接触不多。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是点滴积累来的，如家中的保姆给他讲过八路军军纪严明的事，还有一次，他亲眼看见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三里路为了给老乡归还一个破碗，这让他情感丰富的梁思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更大的触动是一次突然的到访。1948年12月下旬，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张翼若的陪同下，到清华大学拜访梁家，嘱托梁思成在军事地图上标注出北平城区及周边的重点文物建筑，如果迫不得已需要攻城，炮火可以避开这些区域。两军相峙状态下，共产党表现出的对文物的重视和谦虚求教的态度，让梁思成深受触动，他和林徽因毫不犹豫，当即就完成了标注的工作。多年后，梁思成谈起这段经历时，还感慨良多：“童年读《孟子》，‘单食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梁思成《我为什么这样爱我们的党》)

与此同时，梁林二人积极饱满的态度和认真高效的工作，也给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各地文化遗产，第二次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请梁思成编写相关资料，希望在战争中避免或减少对珍贵古建筑的破坏。这是梁思成一直担心且也不敢奢求的大事，他接到任务时甚至感动得声泪俱下。

士为知己者死。梁思成积极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朱中、汪国瑜、罗哲文、胡允敬等教师组成工作小组，夜以继日翻书查资料。林徽因对此也十分支持，她和梁思成一起商定并编撰原则，还细致审阅了最终定稿的条文。最终，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高效完成了任务，编纂成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949年3月，该书的手刻油印本就已发至军中，1949年6月，又由华北高等教育局图书文物处铅印发行。这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虽然只是一个简目，但它“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筑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筑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起到了积极作用”(罗哲文《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这两次合作给梁思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与一些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接触，让梁思成对共产党的好感进一步加深。北平解放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梁思成初识彭真，寒暄之际，彭真引用了梁启超著作中的几句话，对梁思成说：“我相信梁启超先生要是活到今天，他也会拥护共产党的。”彭真对梁启超著作的熟悉，让梁思成吃了一惊，也让他对共产党的干部进一步产生了亲近感。之后不久，在给老同学的一封信中，梁思成感叹道：“清华比北平城早获解放一个月，从解放的第一天起，解放军的纪律就给了我们极深的印象。接着与中央方面的种种接触，看见他们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梁思成《致重寓信》)

的精神，耳闻目见，无不使我们心悦诚服而兴奋。”(梁思成《致重寓信》)

投身新事业：主人翁的激情

新中国需要一套新标识，国旗、国歌和国徽的确定便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6月，新政协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而后决定公开征集国旗、国歌方案及国歌歌词。在国歌、国旗的确定上，梁思成以专家身份参与了评审和完善工作，而在国徽的设计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则担负了负责人和领导者的重任。最初，在筹备会公开征求国旗、国歌方案的启事发布后，梁思成即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积极设计，“大家怀着对新中国无限热爱的心情，夜以继日地精心构思、绘制了十多个国旗图案和十多个国徽图案送去政协筹委会”(朱中《梁先生和国徽设计》)。后来因为公开征集来的方案欠佳，由周恩来提议，改为由梁思成领导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和张竹领导的中央研究院设计组分别开展工作，在两组之中选择一个最佳设计方案。

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开始了废寝忘食的设计工作。一方面，梁思成充分发挥他的组织能力，积极调动、分配各方资源，林徽因、朱中、汪国瑜、胡允敬、罗哲文、莫宗江等，都得以各尽其责。与此同时，梁思成还亲自带领国徽设计小组的师生们，一起做方案，从动手画草图、到绘正式图，从各方面进行探索，反复讨论磋商。超负荷的工作让梁思成的健康加剧恶化，梁思成的身体本就不是很好，青年时左腿骨折过，后又罹患脊椎椎间盘组织硬化，一累就容易病倒，但病情再重也压不住他的工作热情。病倒在床，还经常和林徽因及其他同事讨论方案和设计。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样忘我，用他们的儿子梁从诫的话说，她以主人翁的激情，恨不得把过去在建筑、文物、美术、教育等许多领域中积累的知识和多少年的抱负、理想，在一个早晨统统加以实现。1950年，在外地的女儿梁再冰回家，发现客厅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国徽“作坊”，父母正全神贯注埋头工作，家中沙发上、桌子上、椅子上摆满了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草稿。有时候，身体实在虚弱，林徽因不得不躺在病床上，仍然指导学生绘图，教他们画五星、天安门、稻麦穗、齿轮的技法。

因为工作强度过大，到了最关键的国徽审查会议的那一天，1950年6月20日，梁思成病倒了，竟没有办法参加现场评选，只好委托时任营建系秘书朱中代为出席。最终，梁思成率领的清华大学设计组胜出。此后，梁思成又推荐清华大学教授、雕塑家高庄设计塑造国徽立体浮雕模型。征得中央领导的同意，高庄对原有图案细节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进一步完善。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徽图案及图案说明。

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建造，相比国旗、国徽的设计，要复杂得多，也曲折得多。梁思成直接参与了纪念碑的设计和方案审查工作，在关于碑座设计风格的争论中，他的“赤子之心”体现得淋漓尽致。

1951年，北京市计划委员会设计组绘制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三种草图，其中一个方案碑座是于高台里开门洞的设计，梁思成因在病中，未及过目，就被工作人员递呈市委。知晓设计方案后，梁思成焦急万分，他认为这种设计在视觉上缺乏安全感，同时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还违反结构常理。为此，一向是“谦谦君子”的梁思成慷慨上书北京市市长彭真，直言不讳地对草图设计提出批评，说服市委放弃了这一设计思路。

梁思成对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持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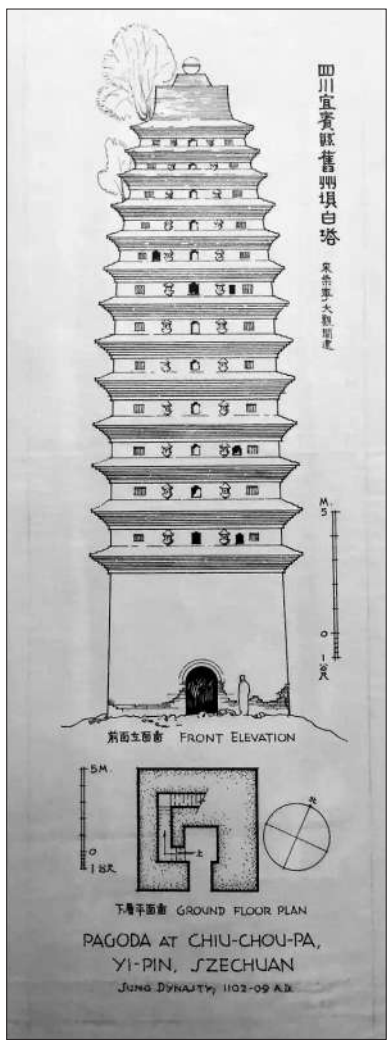
分的责任心，他说要“以对国家和人民无限的忠心，对英雄们无限的敬仰，不能不汗流浹背，战战兢兢地要它千妥万帖才放胆去做”。为了达到“千妥万帖”的目标，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仅在纪念碑外形问题上据理力争，还带领清华师生吸收古今中外设计经验，在碑身的尺度、比例、曲线上做了许多工作。作为诗人，林徽因富有文艺才华，她负责了纪念碑的部分美术设计工作，为碑座、碑身设计了全套纹饰，并对纪念碑的整体造型、结构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最终让纪念碑的造型以尽可能完善的状态呈现给世人。

从“他们”到“我们”：赤诚不改

共产党的赏识和信赖，和人民政府之间几次愉快的合作，让梁思成夫妇无比振奋，也让他们对共产党、新政府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认同。“每一项成就都使我的心进一步爱这个党。不知什么时候起，在我的心里，在我的话里，‘他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党’了”(梁思成《决不虚度我这第二个青春》)。1956年，虽然之前无辜遭到了批判，梁思成仍然积极申请入党，并直接向毛泽东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学生楼庆西后来回忆，在和梁思成的交谈中，“我感到他将党看成一个很纯粹的组织，只有具有高尚人品的人才能加入”(楼庆西《梁思成与他的时代》读后语)。1959年1月，经毛泽东批示，党中央同意，梁思成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终其一生，学者梁思成以一种少见的赤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虽然在特殊时期，曾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也从无怨言，他绝对信任党的祖国。其博大的胸怀，杰出的成就，对祖国、党和人民的忠诚和奉献，让人由衷敬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梁思成手绘宜宾旧州坝白塔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谢冰心、吴文藻夫妇便是著名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1951年，他们从日本归来，为新中国的文学与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两人都有一个立场、思想与感情的转变，这个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人士的休戚与共，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冰心、吴文藻就与周恩来有过接触。1940年，他们举家从昆明迁往重庆，老舍闻讯，即在中法比瑞同学会举行茶话会，欢迎冰心、吴文藻以及茅盾、巴金、徐迟等来渝作家。在渝的作家郭沫若、田汉、张西曼、冯乃超等七十余人出席。喝茶是重庆人的习惯，手中一杯清茶，纵论天下大事。欢迎茶会取圆桌方式，自由组合入座，许多人都是文中相见，见面却是不识其人，待自我介绍后，方拱手作揖，“久仰久仰”。冰心坐下来，身旁竟是阳翰笙，他们之前也未见过面，但阳翰笙认识冰心，便主动打了招呼，说是年轻时便读过她的《繁星》《超人》等。常驻曾家岩的周恩来也出席了茶话会，与大家互致问候。这是冰心、吴文藻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晚年，冰心曾回忆到这次见面：

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晦的屋子里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串难以熄灭的灿烂的阳光！(《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

从日本回到北京后的冰心、吴文藻，开始穿上列宁服与中山装，出现在街头、商场、新华书店，他们挑了许多新书，抱回洋溢胡同的家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吴文藻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这两本书特别看重，从中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史料，对其中与社会学和哲学有关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实践论》《矛盾论》等读得最为仔细，思之再三。闲时，读些描写土地改革的文学作品，并用红的蓝的笔在上面划道道，女儿觉得纳闷，Daddy看小说怎么还划道道？又不是学术著作！吴文藻还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觉得这些书与社会学家的著作并不矛盾，并且可能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发展。

在洋溢胡同的那个四合院里，海棠花在暖融融的春光里盛开，每天都有成群的蜜蜂恋着花枝，嗡嗡之音足可感满院落。脱下冬装的两个女儿，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父母常常倚窗而立，望着她们背了书包走出院门的身影，有种说不出的愉悦。也就在这时，有关方面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们，这满庭芳的小院更是增添了欢乐。隔天傍晚，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在夫人邓颖超的陪同下，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总理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回来了，你们好呵！这“回来”二字，着实令冰心、吴文藻感到温暖。吴文藻坐在周恩来的旁边，向总理谈到自己的身世：原本就是教书的，抗战后到了重庆，误入仕途，又去了日本，本想很快就回来，但没有想到国内的局势……总理接过他的话，连声说，没有关系，革命不分先后，吴先生在日本也为我们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且称赞他“对革命是有贡献的”。总理的肯定令吴文藻感动，他择取要者，向总理汇报了战后日本的有关情况。

那次会见，总理还询问了谢、吴子女的情况以及对工作安排的看法。冰心告诉总理，儿子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两个女儿都在读中学，总理就问，中学之后有什么打算，吴文藻告诉总理，大女儿想学历史，小女儿想学医。总理略做沉思，建议两个女儿学习外语，说，你们家的条件好，学习外语有好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外事活动多，而外语人才奇缺，希望他们不仅为国家培养建设大厦的人才，还要为国家培养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才，并叮嘱，请你们与孩子们商量一下。此后，两个孩子都按总理的希望，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外语专业，后来又在大学任教，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外语人才。总理在这次会见中，还征求了

冰心和吴文藻对工作安排的意見。吴文藻在回国之前，也曾考虑过这个问题，自己能为新中国做哪些工作？吴文藻对印度的情况熟悉，如果能将自己派到印度，可以发挥作用；如果不去印度，则可回到学校教书，这是他的本意。1953年10月，吴文藻接受了新安排，到刚成立不久的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1953年九月间，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各地知名作家、艺术家聚集北京，共享盛会，冰心也出席会议。会议代表几百号人，她只与为大会做报告的郭沫若、茅盾有过交往，报告中的用语、词汇也大都陌生，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比如文学创作是共产党领导的事业，文学事业与党的事业是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还有描写英雄人物等。报告中论述文学艺术的成就，一是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二是讲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这个她闹不清楚，悄悄跑到书店买了一本《讲话》来读，边读边反思自己过去的写作生涯，书中对人性论的批判，对她启发教育极大。会议十几天，冰心住会，天天与新的面孔与新的观念打交道，也觉得蛮有意思。不少场合，当有人介绍到冰心时，就有人说读过她的作品，甚至有人说是她的“小读者”，这让她意外。感受最深的是，共产党对文学艺术的关心与重视，毛泽东讲话，周恩来做政治报告，刘少奇、朱德、陈毅等抽出时间来接见大会的代表，并且在一起照相。冰心是有经历的人，她心里清楚，北洋政府自不必说，国民党也不会这样，欧美的政党领袖最多是竞选时拉拢演员造势投票。共产党为何如此重视作家与艺术家？作为其中的一员，她感受被器重的骄傲与自豪，但也有很大的精神压力。在这次大会上，冰心被选为全国文学艺术界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同时参加了全国文协会员代表大会。她的名字、她的发言，出现在大会简报上，出现在各大报的名单中。消失了多年的女作家冰心，在北京“浮出了水面”，并且是以大会亮相的“华丽转身”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香港《大公报》以北京专讯的方式，首次署名耕野的报道《女作家谢冰心回到了北京》，立即在海外引起反响。经由丁玲、老舍介绍，冰心加入全国文协，并在文协儿童文学组担任组长。此时的冰心，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与描写新生活，描写新中国儿童生活的中篇小说《陶奇的暑期日记》是她归来之后出版的第一部新作品。

1954年6月，冰心、吴文藻一道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座谈讨论。吴文藻首先注意到总纲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他认为，这就表明新中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多民族国家，同时也表明多民族所构成的国家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宪法主张，多民族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民族关系之上的，因此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这时，吴文藻在民族学院承担着培养年轻学者与教学的任务，作为教研室主任，组织民族问题与民族学的教学，帮助青年教师修改讲稿，为充实丰富民族志的教学内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民族学教研室，青年教师是一线教学主体，他们对自己研究的某一民族有较丰富的专业知识，但有的人在综合能力及视野方面可能较为欠缺，吴文藻便站在理论的高度与学术的视野上，在资料的综合与使用上，指导年轻的教师们。同时，他自己重点研究讲授的是藏族，完成了简介式的《中国少数民族》(英文稿)的编写。1957年2月，早春的季节，吴文藻接到正式通知，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委

员，表明了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对他的信任与尊重。冰心在国内刚刚“浮出水面”，便频频被派往国外访问，开始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执行重要的政治与外交任务。1955年，冰心两次被派往印度，出席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团结会议，并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之后又接受了新任务，参加以李德全为团长的中国妇女代表团，前往洛桑出席世界母亲大会，并访问瑞士、法国、苏联、捷克。8月又出现在中国代表团中间，出席日本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此前的1954年底，冰心还回到故乡福建参观访问，长达一月余。这段时间，冰心创作了大量文章，描写新的生活，表现新中国的美好形象。不久之后，她的代表作《小橘灯》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为她赢得了新中国青少年的喜爱。(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冰心文学馆首任馆长)

冰心吴文藻：旅雁归来又青春

□ 王炳根



《小橘灯》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



吴文藻(1901—1985)，江苏江阴人。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